

延续与断裂：明清《合州志》关系述论^{*}

彭兴隆 曹金发

提 要：清前期的《合州志》版本中，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合州志》抄本很可能不是康熙十一年成书的正式的《合州志》版本，而《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引用的《合州志》才应是康熙年间正式成书的《合州志》。此外，所谓乾隆初年许元基编的《合州志》抄本也是后人层累构建起来的一个并不存在的版本。清代现存最早且无争议的《合州志》版本为乾隆十三年本，该志与万历《合州志》之间存在一定内容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却不为乾隆十三年志的编修者群体所自知，体现出明清《合州志》内容的延续与修志记忆断裂的矛盾统一。

关键词：明清《合州志》 延续 修纂记忆 断裂

合州，即今重庆市合川区，明清时期修纂有多部《合州志》，是研究钓鱼城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学界对其多有引用，但目前对于明清《合州志》的专门研究似尚不多见。关于明代《合州志》的专门研究，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罗中典、戴蕃璠的整理与校勘，罗、戴二人将刚从日本内阁文库影印回国的万历《合州志》从缩微胶卷中手写录出，并加以校注标点，于1978年石印成书。该整理本卷末附有戴蕃璠《后记》一篇，对万历《合州志》做了综合性评述。^①1995年《合川县志》亦收录戴蕃璠的《万历〈合州志〉提要》一篇，对万历《合州志》体制结构、内容、史料价值与不足作出评述。^②关于清代《合州志》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唐唯目《刍议清初〈合州志〉稿本》，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合州志》抄本进行考察，认为该抄本为清康熙十一年（1672）知州孙国衡所编。^③高宏《清代〈合州志〉编纂述论》从编纂人员、内容书写、体例、编纂思想4个方面对清朝4部《合州志》进行整体性研究。^④总体来看，前辈学者对明清《合州志》之间的关系论述似涉及未深，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清初几部《合州志》版本梳理入手，以万历《合州志》与清乾隆十三年（1748）《合州志》之间的关系为抓手，对明清《合州志》关系作一浅探，以助相关研究。

一 清前期《合州志》版本梳理

关于明清《合州志》到底存在多少个版本，目前看似尚有可讨论之处。1995年《合川县志》版本梳理是通行说法，其认为明清合州地方志共计7次成书，即明弘治十六年（1503）、万历七年（1579）、康熙十一年、乾隆初、乾隆十三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光绪二年（1876）。^⑤其中弘治本已佚，万历本仅存一套孤本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乾隆十三年本、乾

* 本文为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明清《合州志》的延续与断裂”（项目编号：CX2022003）成果之一。

① 参见戴蕃璠：《重印明万历〈合州志〉后记》，万历《合州志》卷末，重庆市合川县图书馆，1978年整理本，下册，第81—83页。

② 参见合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2—833页。

③ 参见唐唯目：《刍议清初〈合州志〉稿本》，《四川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1期。

④ 参见高宏：《清代〈合州志〉编纂述论》，《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2期。

⑤ 参见合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川县志》，第674—675页。

隆五十四年本、光绪四年本（光绪二年成书，四年付印）则相对较为常见，是较为确定的版本。而尚值得讨论的是康熙十一年本和乾隆初许元基抄本。除此之外，康熙时期可能还存在一至两部《合川县志》未统计到的《合州志》。

（一）康熙朝的《合州志》

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合州志》抄本实为明史馆中之物，成书时间应在清康、雍两朝，确为清初抄本，但不能肯定其就是清康熙十一年正式成书的《合州志》。其内容与康熙十年（1671）成书的《四川总志》合州部分高度重合。从种种痕迹来看，该志似乎是直接从康熙《四川总志》中合州部分节抄出的部分内容，或者是与康熙《四川总志》出自同源的不完整过录本。其内容很可能是明史馆臣或一统志馆臣在编纂过程中抄写的参考资料，能否算作一个独立的《合州志》版本似还需讨论。^①且其内容、体例均不甚完整，篇幅较小，仅30页，对后来《合州志》的修纂也似未产生影响，甚至清乾隆时期就已无人知道这部清初《合州志》。因此，该志成书时间和文献学地位似还存在一定商榷空间，其在明清《合州志》修纂的承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从《古今图书集成》所引内容来看，康熙年间很可能有正式成书的《合州志》，因为其中引用了两条《合州志》材料，分别为“宕渠江”条：“按《合州志》：宕渠江来自巴州，流经渠县、广安州，过岳池至合州界丹溪，接流一百里至渠口。又过州治东北，与嘉陵江合流东注。”^②“嘉陵江”条：“按《合州志》：嘉陵江自广元流经保宁府阆中县、顺庆府南充县至李渡场交定远县界，接流一百八十里至定远县城西。又自定远县顺流十里至南溪口，交州界，接流一百九十里至宕渠江会合，又十里，至合州城东与涪江合流东注。”^③经过对比，发现这两条材料不光与唐唯目所考之清初《合州志》抄本不同，还与今所见明清《合州志》版本内容亦不同，且不见任何《合州志》版本以及后世材料提及过该版本《合州志》。该志应为一个未知版本的《合州志》。今所见相关信息仅《古今图书集成》所引两条材料，似尚不足以推测其成书年代。但从目前所知情况来看，这部《合州志》应不太可能是明代志书。因其与万历七年本相关内容并不相同，而更早的弘治《合州志》早在万历时期就仅存十之一二了，经明清易代后恐更早已不存，因此其大概率就是清代所修。《古今图书集成》定稿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或次年初。^④而雍正帝登基后，《古今图书集成》已印刷9600余卷，印刷工作几近完成，而后的总裁官蒋廷锡仅对部分内容作校正，并未再大规模改动。因此其中所引之《合州志》时间下限应在康熙五十八年之前。而其上限则应不会早于康熙初年，因为整个顺治年间，四川仍处于清军与大西军残部的战火之中，直到康熙元年才基本安定。这期间局势混乱、民生凋敝，合州地方官恐无暇顾及修志之事。因此《古今图书集成》所引之《合州志》大概率应是修纂于康熙元年至康熙五十八年这一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又有约3次修志高潮。首先是康熙十一年由卫周祚建议纂修《一统志》，并要求各省修通志以呈。时四川省也曾修有总志，即康熙十一年《四川总志》，但其主要是在明代总志基础上成书的，似未大规模要求下级政府修志以备参考，同时

① 以上问题，笔者已另有文章叙述，请参考拙文《清初〈合州志〉抄本考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②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266《江部汇考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204册，第32页。

③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301《涪水部汇考》，第207册，第17页。

④ 参见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期重庆所修志书也并不多见，因此当时的合州并不确定是否为此修有志书。^① 随后不久，三藩之乱爆发，第一波修志浪潮被打断。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再次提及修志事宜，康熙二十二年，大学士明珠建议：“《一统志》关系典制，自应催令速修。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觉迟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② 这次建议后，全国范围内兴起第二波修志浪潮。如康熙二十四年《兴化县志》载：“今上御极之二十一年，命使臣纂修《一统志》，诏天下府、州、县各以其志来上。”^③ 说明可能在康熙二十一年，朝廷已开始强调修志事宜，且已落实至县级政府。合州邻近的荣昌也收到修志命令。《荣昌县志·史彰序》载：“迨乙丑（康熙二十四年）之夏，余□摄永、璧二县，奉旨购藏书修县志……余时所领荣、大、永、璧四邑皆接壤荒区，人与书茫无可据，而府檄频催，不容少缓，其时不纂难乎？”^④ 则当时重庆府落实修志命令的力度可见一斑。同为重庆所辖的彭水县也于康熙二十四年修有志书，其序载：“（康熙二十四年）于是政府檄下，再征蜀志，九郡承风。”^⑤ 涪州也在康熙二十二年修有志书。此外，据唐光荣考察，康熙二十四年也有一部《重庆府志》成书，其依据同样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引。^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合州在康熙二十年代初也极有可能修纂有一部志书。唐光荣还认为重庆在康熙五十年前后还有一次修志高潮，同样是在《大清一统志》编纂背景下，应上级政府要求所致。这一期间，重庆府修出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涪州志》，康熙四十九年《丰都县志》、《彭水县志》等志书。^⑦ 康熙五十年前后，《古今图书集成》初稿虽已完成，但还处于修改校订过程中。据裴芹考察，《古今图书集成》所引材料最晚至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⑧，则说明如果康熙五十年前后有《合州志》成书的话，是有可能被《古今图书集成》引用的。

因此，在康熙年间，合州存在至少一部《合州志》是可以确定的。其最有可能成书于康熙二十年代初，也有可能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前后，抑或是康熙二十年代与康熙五十年代各成有一部《合州志》，惜目前所见材料有限，无法进一步厘定。而康熙年间所成的《合州志》与今见国图所藏的清初《合州志》抄本之间是否存一定联系，也无法解答。

（二）“层累造成”的许元基抄本《合州志》

多种资料提示除清初《合州志》抄本外，乾隆初年还有许元基所抄之《合州志》。但这一抄本十分神秘，不光没有关于该志的论著出现，甚至连其文本也难得一览。目前最早关于许元基抄《合州志》的信息发现于1978年合川县图书馆翻印的万历《合州志》“翻印说明”中，其中载道：“州志在国内目前还保留有版本的，仅只以下几种：一、清初旧抄本合州志，清许元基纂，上海复旦大学有藏本，北京图书馆摄有胶卷。二、宋锦修《合州志》八卷，乾隆十三年版……”^⑨ 可见该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有胶卷。然而通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并不见该本踪迹，又询问于复旦馆方，亦只得到未发现相关古籍的答复。其图书馆馆藏

① 参见拙文《清初〈合州志〉抄本考论》，《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②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中华书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14册，第6745页。

③ 张可立：《兴化县志叙》，康熙《兴化县志》卷首，康熙二十四年（1685）抄本，第3页。

④ 史彰：《荣昌县志旧序》，乾隆《荣昌县志》卷首，乾隆二十九年（1764）增刻本，第3页。

⑤ 朱尔捷：《原叙》，光绪《彭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4页。

⑥ 参见唐光荣：《〈古今图书集成〉本〈重庆府志〉考》，《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4期。

⑦ 参见唐光荣：《〈古今图书集成〉本〈重庆府志〉考》，《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4期。

⑧ 参见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⑨ 合川县图书馆：《翻印说明》，万历《合州志》卷首，重庆市合川县图书馆，1978年整理本，上册，第1页。

目录已几乎完全反映了复旦大学所藏之古籍：“目前，馆藏古籍书、目基本相符，公务目录及读者目录（卡片式）齐备，近年来，已据馆藏目录建立电子检索系统。”^①查《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该目录乃在近年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的背景下编制，能完整反映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以前古籍情况，但亦无收获。又查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只发现万历《合州志》和光绪《合州志》的胶卷，未发现许元基所抄版本的缩微胶卷。此外与《合州志》抄本相关的信息就是一本不分卷的《合州志》抄本，并未标记为许元基所纂，而该本实际上是唐唯目所考察的清初《合州志》抄本。同时又询之于国图馆方，得到了“馆藏目录查询不到的书籍均为国图所不藏”的明确答复。两个大型图书馆同时遗失许元基抄本的可能性应不大。再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及《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方志考》《稀见方志提要》等各类大型古籍目录提要及数据库，均未发现许元基编《合州志》抄本的记录，遂怀疑该本并不存在。

从许元基角度看，其为常州武进人，并非合州人，也没有在合州做官的经历，且其为监生，并非知名文士，因此其几乎没有可能为合州编写或抄写一部志书。但其确实是在合州附近的大足、荣昌做过主官，并编有乾隆十一年（1746）版《荣昌县志》，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本。其序中提到：“自雍正七年拣选入蜀，历任蒲江、大邑、大竹、大足、南川，与今荣昌凡六邑。”^②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许元基为编修《荣昌县志》而抄写过一部《合州志》。虽然“乾隆初年”这个概念较为模糊，无具体年份，但成书于乾隆十三年宋锦、刘桐版《合州志》应与乾隆初年许元基抄本《合州志》的成书时间十分接近，如果此时有抄本或旧刻本存世，何以宋锦、刘桐会完全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存在？如乾隆十三年《合州志》修者宋锦所说：“我朝定鼎已逾百年，官斯土者，皆以繁剧重地，日劳劳于簿书期会间，笔墨之事，未遑及也。”^③如果合州当地主官都不知道合州存在旧本方志，则许元基作为一个外县主官，从何处能得到《合州志》的旧本？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志版本应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即完全亡佚。因此，许元基在乾隆十三年本之前抄有一个《合州志》的几率微乎其微。现在存在的可能性只有许元基抄本成书于乾隆十三年本《合州志》之后，或者其就是乾隆十三年本的抄本，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不大。首先，许元基在乾隆十三年已经离任荣昌，据光绪《荣昌县志》载：“许元基，江苏武进附监，乾隆五年任，见政绩。鲁克让，旧志逸，阅艺文《李母吴孺人赞》乃知其十三年署，增之。胡峤，广西马平进士，乾隆十三年任。”^④可知在许元基和乾隆十三年到任的胡峤中间还有一任知县，则可以确定乾隆十三年之前许元基已经离任。而其离任后并未到合州及其附近地区任职，从乾隆三十年所修的《武进县志》即可看出：“参订：……原任四川荣昌县知县许元基。”^⑤又如其后的“荐辟”目所载：“许元基，维楫孙，生员，纂修《古今图书集成》，荣昌知县。”^⑥可知其最后任职的地方就是荣昌。因此许元基的整个宦迹生涯都与合州没有关系，并且其在乾隆十三年之前就已经离任荣昌，则其不太可能看到乾隆十三年成书的《合州志》，也就不太可能抄写一部乾隆十三年版的《合州志》。加之有许元基抄本《合州志》这一说法出现相当晚

① 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② 许元基：《新修荣昌县志序》，乾隆《荣昌县志》卷首，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第1页。

③ 宋锦：乾隆《合州志》卷首《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志志辑，巴蜀书社，2016年，第9册，第82页。

④ 文康修，施学煌纂：光绪《荣昌县志》卷9《职官》，光绪十年（1884）刻本。

⑤ 王祖肃等修，虞鸣球等纂：乾隆《武进县志》卷首《职名》，乾隆三十年刻本。

⑥ 王祖肃等修，虞鸣球等纂：乾隆《武进县志》卷9《职官》。

近,遂知该说法为后人之误传。

实际上清朝《合州志》只存在一个抄本,所谓“许元基抄本”就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初《合州志》抄本。仔细梳理材料即可看出一个“层累造成”的许元基《合州志》抄本。“清初抄本《合州志》”这一说法较早见于1941年万斯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其载:“《合州志》不分卷,不著纂修名氏,旧钞清初本,存一册。”^①而后又见于1958年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旧钞清初本,不分卷,不著编纂人。”^②晚至1985年何金文的《四川方志考》中都还用“清抄本”指代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合州志》抄本:“殆及明末,方有人再举修志事,迄今见北京图书馆收藏一部清抄本(内阁大库书),不分卷,亦不著纂修人。”^③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的目录提要均以“清初抄本”或“清抄本”来指代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合州志》抄本,但均未提及该抄本为乾隆初年许元基所抄,也未提及复旦大学有藏本。而笔者目力所及,将许元基与清初旧抄本《合州志》联系起来的说法首见于1978年合川县图书馆整理的万历《合州志》卷首《翻印说明》。其提法是“清初旧抄本《合州志》,清许元基纂”,而非“清乾隆初《合州志》抄本”,应也是来源于以上目录所提及的“清初抄本”,但其加入了两个新的元素,一是将其纂者冠名为许元基,二是将其馆藏标为复旦大学图书馆。但合川县图书馆是依据何种资料得出其为许元基所纂,又何以得知其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已不可知,不知是否是将其与乾隆初许元基修的《荣昌县志》相混淆?但总而言之,“许元基编《合州志》”这一说法一开始就是矛盾的,因为从前文已可知许元基为合州编修或抄写一部地方志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且许元基主要活动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如果其真编有一部《合州志》,称其为“清初抄本”似也并不十分合适。尽管这一说法有矛盾,但“复旦大学藏许元基抄本《合州志》”的说法还是就此形成,并且在其后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矛盾得到逐步消解。如1988年吴枫所编之《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即沿用“许元基旧抄本”的说法,但又进行细节上的改动:“[合州志]地方志。……2、清许元基纂。有旧抄本传世。”^④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并不提“清初”二字,应是发现了其中矛盾。这样“清初旧抄本”就演变为“清旧抄本”。而后唐唯目担任副主编的1995年《合川县志》在这个层累建构过程中起了最关键作用。其一方面引入唐氏1986年《刍议清初〈合州志〉稿本》最新考证成果,将“清初抄本”定名为“康熙十一年《合州志》”;而另一方面,又将原有的“许元基纂清初旧抄本”的说法加以保留:“四、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州孙国衡修《合州志》,卷帙不详,只存手稿30页,藏北京图书馆。五、清乾隆初,许元基编抄旧本《合州志》,未付印,稿藏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⑤这样即由原来的一个“清初抄本”演变为一个“康熙十一年孙国衡抄本”和一个“许元基抄本”,一分为二,就此导致了本质变化。虽然其与吴枫《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并不一定有直接承袭关系,但此时《合川县志》的编者无疑也注意到许元基是乾隆时人,遂将“清初许元基抄本”改为“清乾隆初许元基抄本”,进一步合理化,至此层累构建基本定型,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引用,使得一个虚构的许元基抄本《合州志》与真实的清初《合州志》抄本共存近40余年之久。

通过梳理可知,明清时期确切修纂的《合州志》共计应有6部,分别为:弘治十六年本、

① 万斯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图书季刊》1941年第3期。

②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68页。

③ 何金文:《四川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267页。

④ 吴枫:《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47—348页。

⑤ 合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川县志》,第674—675页。

万历《合州志》。如“官迹表”一条，就能较为确切地证明这一点，通过内容对比，发现乾隆十三年本在“知州、同知、判官、吏目”的前部分均与万历志高度相似，而“知州”条内容在“梁榑”后不再相似，“同知”条内容在“沈哲”后不再相似，“判官”条内容在“蔡蓁”后不再相似，“吏目”条内容在“周希钦”后不再相似，以上四处断裂部分正好都在万历志的卷3第13页。^①可以很容易地从这样的断裂处看出其参考万历志的痕迹，其或是直接转抄于万历志，或是间接转抄于未知康熙《合州志》，但其内容来源于万历《合州志》应是确定的。而清初抄本《合州志》亦无该项内容。又如合州“城池”一条，见表2：

表2 “城池”内容对比

书名	内容
万历《合州志》	州旧城元末建，岁久，夷为民居。天顺七年，知州唐珣奉诏鼎新修筑，周回二千九百二十四丈三尺，高一丈七尺，上阔一丈三尺，下阔一丈五尺。城壕三面临江与溪，城门十一，皆以石券 ^②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	旧州城元末建，岁久，夷为民居。明天顺七年，知州唐珣新修筑，高一丈七尺，上阔一丈三尺，下阔一丈五尺，周阔一十六里二分，计二千九百二十四丈三尺。三面临江与溪，一面倚山，城门十二 ^③
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	元末始建今治，岁久，夷为民居。明天顺七年，知州唐珣新修筑，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周一十六里二分，计二千九百十六丈。门十二。 ^④ （光绪四年《合州志》同）
嘉靖《四川总志》	石城天顺中知州唐珣重修，高一丈七尺，周围二千九百二十二丈，门十一 ^⑤
万历九年《四川总志》	石城天顺中知州唐珣重修，高一丈七尺，周围二千九百二十二丈，门十一 ^⑥ 。（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同）
清初《合州志》抄本	石城明成化中知州唐珣重修，高一丈七尺，周二千九百二十二丈，门十二。 ^⑦ （康熙《四川总志》同）

表2将乾隆十三年本的承上启下作用体现得较为明显，其在承袭万历志的基础上又加入最新的调查数据，并影响到后续《合州志》。而清初《合州志》抄本中也有此项内容，但又有不同，通过其与嘉靖、万历《四川总志》的比较发现，清初抄本应属于《总志》系统，与《合州志》

① 参见刘芳声修，田九垓纂：万历《合州志》卷3《官迹表》，及宋锦：乾隆《合州志》卷3《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104—108页。

② 刘芳声修，田九垓纂：万历《合州志》卷1《城池》。

③ 宋锦：乾隆《合州志》卷2《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97页。

④ 周澄修，张乃孚纂：乾隆《合州志》卷4《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274页。

⑤ 刘大漠修，杨慎纂：嘉靖《四川总志》卷9《重庆市·建置沿革》，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

⑥ 虞怀忠修，郭棐纂：万历《四川总志》卷9《重庆市·城郭》，万历九年（1581）刻本。

⑦ 《合州志·合州城池》，清初不分卷抄本。

系统存在一定区别。且其关于重修城池的年代记载有误，明代《四川总志》、万历《合州志》、乾隆十三年《合州志》等均认为石城修于天顺年间，而清初《合州志》抄本及康熙《四川总志》认为其修于成化年间，体现出清初《合州志》抄本在明清《合州志》修纂系统间的独立性。

又从体例来看，万历志与乾隆十三年志之间似乎又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联系。万历《合州志》分8卷，为纲目式体裁，分为天文、地理、王制、人物、外志五大目，下分为53个细目。乾隆十三年本《合州志》也分8卷12目，为天文、地理、建设、秩官、学校、选举、人物、赋役、物产、风俗、艺文、外纪，下分68个细目，见表3。

表3 “纲目”对比

万历《合州志》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	
纲目	细目	纲目	细目
天文	分野	天文志	星野
地理	沿革、疆域、形胜、风俗、城池、山川、溪、井泉、石、岩、洞、陂塘、园池、坊市、乡镇、土产	地理志	沿革、疆域、形胜、山川、石岩、井泉、沱洞、陂塘、园池、古迹、八景
王制	公署、学校、建官、属官、官迹表、学官表、属司表、科贡、恩典表、仓库、田赋、户口、贡赋、庸调、商税、祀典、坛壝、演武、牌坊、驿传、铺舍、桥梁、津渡、堤	建设志	公署、城池、驿传、铺舍、塘汛、坊市、乡里、津渡、桥梁、救生船、坛祠、寺观、养济院、漏泽（园附）
人物表	先贤、孝行、贞节、隐逸、方术	秩官志	知州、州同（今裁）、州判（未设）、学正、训导、吏目、驻防
外志	古迹、祠庙、寺观、亭堂、莹墓、仙释、灾祥	学校志	学宫、庙号、祀典、礼乐（各祠附）、名宦、乡贤（坛祠附）、教条、学田、义学、宾兴、乡饮、书籍
		选举志	进士、举人、贡生、武科、例贡、掾士
		人物志	名哲、孝义、武勋、隐逸、节烈
		赋役志	户口、田粮、课税、额解、岁支、仓储
		物产志	
		风俗志	
		艺文志	艺文、诗、杂著
		外纪	祥异、仙释、轶事

从二者的体例对比来看，除了都分8卷以及天文、地理部分结构稍有类似，其余部分均显示出十分明显的差异。万历《合州志》分类较粗糙、杂乱，且结构不均衡。而乾隆十三年《合州志》虽亦有不甚合理之处，但相较于万历志则分类更加合理，结构较为完善，与万历志形成较

大差异。直接观察下,很难发现二者存在承袭关系。两志之所以在体例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一方面是万历志经过明末兵燹,已残缺不全,导致清人只能依据残篇断简作为参考而无从得知其整体体例。从其内容对比上亦可看出这一点,两者全书的内容虽有部分相同,但大多都散落于各篇之中,较少出现集中大片承袭的情况,经笔者粗略对比,发现乾隆十三年志约只承袭了万历志二十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即反映出当时万历志十不足一的残存状况。另一方面,即使当时残存的万历志仍能看到目录,但由于其体例安排不合理,结构失衡,清人也并没有采纳该志体例而是选择另起炉灶。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导致二者之间体例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都折射出明清《合州志》修纂存在的断层。这一断层不光体现在体例上的明显差异,还体现在乾隆十三年《合州志》作者群体修志记忆的断裂上。从内容上看,乾隆十三年志的确与万历志存在继承关系,但在乾隆十三年志的序跋中,却均不见修纂者提及万历志、康熙志以及清初《合州志》抄本,似乎并不知其所修志书的资料来源,陷入一种集体失忆的状态。

三 明清《合州志》修纂记忆的断裂

这种集体失忆的原因要从乾隆十三年本《合州志》的修纂过程说起。该志成书共经4人之手,历3次转接。其草创者为州人邹珩,搜集资料历时40年,未成而歿。据是书“雍正癸卯(雍正元年)·恩科”条载:“邹珩,字元美,号蓼斋,苦行力学,有先民矩度,州志失编,采辑四十年,仅草创而歿。”^①邹珩歿后,志稿存于其弟子谭玉书之手,而后在乾隆十二年(1747)宋锦任知州期间,谭玉书将志稿献上,由宋锦继续增补校订:“郡孝廉邹君珩搜罗数十载,集成志稿约八十余页,未竟而歿。余视事后,得之其门人谭子玉书,遂细加参订,广为采辑,阙者补之,讹者正之,有增无减,共成八卷,其莫可稽考者仍为阙疑。”^②然而在书成准备付梓时,宋锦因丁父忧去职,于是志稿即流转至新任知州刘桐之手:“甫欲寿之枣梨,传之奕祀,越明年,闻父忧。中丞纪公令予代篆事,既至,在中年兄出所修稿本示予曰:‘是固予志之未卒者,今方寸乱矣,以囑君。’”刘桐并未经过大的修改即将其付梓:“予披其集,义例精严,条类晰密,有典有则,不蔓不支……不禁恍然曰:‘是岂徒为备厥纪载乎,实他日国史之一助已’……爰命梓人刻日成之,则予今日之志亦即我在中年兄之初志也。”^③

从其修纂过程来看,乾隆十三年《合州志》修纂历时较长,转接次数多,且最重要的初稿作者在此过程中去世。而后的转接过程中又有编纂信息的遗失,导致后来的地方主官都不知道邹珩志稿取材于何处。因此,作为编修者的宋锦、刘桐等,对该志与明朝、清康熙《合州志》的联系是缺乏认知的。即使是邹珩自己很可能也并不知道其所搜集之材料为万历刘芳声所修的《合州志》,故其在对万历《合州志》的编修者知州刘芳声的介绍中并无修志等相关功绩说明。且由于邹珩仅草创书成就已去世,其在草稿中并未交待该志资料来源以及序言等关键信息,其弟子谭玉书在转接过程中也不知或未提及邹氏修志材料来源于何处。当志书交接到宋锦手中时,只有80多页手稿,并未附带邹珩修志之原材料,其只知邹氏搜罗数十年,而不知其从何处搜罗。而后到任的刘桐亦不知万历《合州志》与乾隆《合州志》的联系,只是知道可能其中收集了一些前明的资料:“合阳为巴东名郡也哉,第自明季兵荡之余,典坟灰烬,所存者千百什一耳,即

① 宋锦:乾隆《合州志》卷5《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141页。

② 宋锦:乾隆《合州志》卷首《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82页。

③ 刘桐:《合州志序》,乾隆《合州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81页。

有一二留心文献之士，目见耳闻，随在登记，未免挂一遗百，存不抵亡。”^① 则合州前志的修纂记忆在本就不完整的情况下经层层传递，形成递减，最终造成记忆的遗失。耆贤邹珩很可能是清代合州最后一个对万历《合州志》有所接触的人，当他去世后，关于万历《合州志》的所有认知均随之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中。而对于康熙朝所修的《合州志》，宋锦、刘桐也只字不提，宋锦甚至明言清定鼎百余年来未遑及笔墨之事。实际上邹珩的志稿很可能和康熙《合州志》可能存在一定联系。邹珩应是乾隆初年去世的，其弟子谭玉书在乾隆十二年将志稿交给知州宋锦时即说到“怀此已若干年矣，恐当事者目为迂疏不急之图，逡巡弗敢遽进”^②。邹珩应是在去世前将志稿交予谭玉书的，其时才过去若干年，应不会很久，因此推测邹珩去世应在乾隆初。以乾隆初年为基准，往前追溯40年，即是其开始搜集资料编纂志稿的时间，大致应在康熙四十年代。则有可能与康熙后期合州的第二次修志活动重合，或与其存在某种关联，惜目前材料过少，已不可考。总之，由于邹珩与合州地方官之间信息传递的断层，使得合州方志修纂记忆在明清之间，乃至在清朝前中期之间都出现了断裂。

地方志一般为州县精英编纂，其流传也主要在少数地方知识精英圈子里。范莉莉以《姑苏志》为例，认为其书写者、续写者与阅读者、使用者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志书的编修、刻印、保存以及更新的过程，是在一个十分封闭的自运行系统中完成的。^③ 这种封闭性决定了地方州县志的修纂记忆一般仅体现在少数地方官员和本地知识精英身上。但地方官是一个具有较大流动性的群体，其虽然在修志事务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是方志修纂的代表，是修志记忆的主要承载者，但由于历任官员工作调动频繁、交接有限，修志记忆很难通过官员之间的直接交接而得以继承。这种修志记忆传递需要两个介质，一是“文”，二是“献”。“文”即是地方志文本，书籍是传递信息最直接和准确的介质。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涪州知州董维祺初到涪州时，旧志已“久没于明季之灰烬”，而后通过购得一郡志稿本，方才了解涪州前志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前守萧公之手。^④ 康熙四十九年编纂《彭水县志》时亦是如此，知县陶文彬于地方士人倪孝廉处获得康熙二十四年所修的志稿一帙，方知“前令朱公先有同心”^⑤。通过文本，新任主官方才得以赅续修志记忆。一旦这一环节出现断裂，例如官方层面存档丢失、民间层面传播不广等因素导致文本失传，新到任的外地官员缺少信息传递介质就难以维持地方修志记忆的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献”即地方知识精英能充当信息的传递者，则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记忆的连续。如康熙二十二年初创《涪州志》时，前明耆贤刘夏文等“博闻强记，堪备顾问”，共采其当时所见所闻，而汇集成帙。^⑥ 可见地方士人以自身知识和所藏文本充当了官方存档地志之外的记忆载体，在官方机制失灵的状态下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合州志》的记忆传递表现出类似的情况，其同样是通过以邹珩为代表的地方知识精英传递文本的方式得以继承前志。但恰好由于不可控的个人原因，造成前志文本与修志记忆这一对统一体出现分离。这体现出民间知识分子传递信息的不确定性。虽然本地知识分子相较于外籍官员来说较为稳定，能够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记忆的连续性，但其缺乏官方平台制度性因素的加持，影响力有限。且落后地区知识精英数量

① 刘桐：《合州志序》，乾隆《合州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80—81页。

② 刘桐：《合州志序》，乾隆《合州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9册，第81页。

③ 参见范莉莉：《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④ 参见董维祺：《重庆府涪州志序》，康熙《涪州志》卷首，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

⑤ 陶文彬：《原叙》，光绪《彭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1875）刻本。

⑥ 参见冯懋柱：《附序》，康熙《涪州志》卷首，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过少，导致其传播范围及准确性受到个人因素的限制，是十分脆弱的传递脉络。康熙前期合州地区刚经历战乱，人烟稀少，据康熙二十四年的统计，合州户口507户，男、妇共1013口，加上铜梁县、定远县、安居县三地的户口总共也不过784户，1567口。^①这决定《合州志》修纂记忆的承载者极少。邹珩可能就是康、雍时期的合州为数不多的本地精英，很可能参与了康熙朝《合州志》的修纂工作，因而能够掌握一部分《合州志》修纂材料。而由于官方档案保存不善以及地方官的离任，修志记忆逐渐从官方让渡到以邹珩为代表的地方士人身上。随着邹珩的离世，《合州志》的修纂记忆再无承载者，地方精英到主官之间的信息传递断裂，进而在官方层面造成修纂记忆的遗失。幸而其所纂的文本被传递到了官方，使得志书内容独立于修纂记忆而得到部分传递。今人能够通过万历《合州志》与乾隆十三年《合州志》的对比发现其中联系，但由于康熙《合州志》内容的少见，我们已无法了解康熙志与乾隆志之间的具体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明清《合州志》内容的部分延续而修志记忆断裂的矛盾统一。

结 语

今见明代的《合州志》仅万历七年《合州志》，其历经明清兵燹，至清乾隆时在中国已几近亡佚。入清后，合州应在康熙二十年代初和康熙五十年代前后修纂有一至两部志书，但由于文本传播范围有限，今已亡佚。今所见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清初《合州志》抄本似与康熙《四川总志》关系更为密切，其文本完整而内容不全且不成体系，有可能节抄于后者，因此其是否是一个独立成书的《合州志》版本似还尚需讨论。今学界认为乾隆初期还有一个许元基抄本，但实际上，这只是现代学者的误传，是“层累造成”的版本，其说法源头仍来自国图所藏的《合州志》抄本。则今所见的最早且无争议的清代《合州志》为乾隆十三年本《合州志》，该版本来自于合州知识分子邹珩的藏稿。通过对比乾隆十三年《合州志》与万历《合州志》，发现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一定联系，其内容中也很可能有一部分承袭自康熙《合州志》。因此从整体来看，明清《合州志》的修纂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但乾隆十三年《合州志》的作者对于这种联系却呈现出集体失忆的状态，体现出明清《合州志》在文本延续和记忆断裂两个层面的矛盾统一。同时，官方层面方志的存档制度及其在方志记忆的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值得进一步重视。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09《重庆府部》，第109册，第49页。